

2006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李仲明 刘 兵 高士华

2006 年召开的相关会议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日本“孩子与教科书 21 世纪网络”和韩国“历史教科书运动本部”协办,1 月 7—8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4 月 21—23 日在杭州召开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另外,由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联合举办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于 12 月 29—30 日在北京举行。2006 年在中国出版的相关图书主要有: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和《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 3 月出版);吉林省档案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整理编辑的《日本关东军报告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006 年出版,已出版 84 集);涂文学、邓正兵主编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7 月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辑的《中共党史出版社 9 月出版》;菊池一隆著,林琦、陈杰中译,朱家骏主编的《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香港光大出版有限公司 2 月出版)等等。现仅以笔者所见研究著述与论文做以下述评。

一 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2006 年度对日本侵华的研究包括日军暴行、细菌战与毒气战、慰安妇问题、日本对华的毒品政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等诸多方面,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日本侵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对于日军慰安制度的研究仍是本年度日本侵华研究的重点内容。华强撰文认为, 日军“慰安”制度初创于中国上海, 随着战争的进展, 日本将这种制度推向了西南太平洋海域周边诸国。从地域上看, 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 从肤色上看有黄种人、白种人和黑人。慰安制度有明显的国际化倾向, 是日军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研究》第 3 期)。姚霏对上海四川北路的日军慰安所作了详尽的个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第 3 期)认为,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作者通过实地考察, 认为上海美楣里和克明里的慰安所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有海军慰安所; 横滨桥地区是日军慰安所高度集中区域。这些著述既有对历史的研究又有对现状的描述, 进一步揭示了慰安妇制度的罪恶。

对日据台湾时期的研究是近年来日本侵华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人为了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 鼓吹说日本为在台湾实施宪法特意制定了《有关应施行于台湾法令之法律》, 即俗称的“六三法”, 而“六三法”是否违宪在当时的日本朝野及学术界引起的争议, 是围绕“台湾是否是殖民地”而进行的, 因此说台湾不是

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李理通过对“六三法”存废的研究后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六三法”根本就不是为要在台湾实施日本宪法而制定的;围绕“六三法”存废的争议更不是为了将日本宪法施用于台湾,也不是在讨论“台湾是否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是日本政党势力与执政的军势力就各自对台湾统治方针的妥协和斗争。从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到 1945 年日本战败中国收回台湾主权期间,台湾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抗日战争研究》第 4 期)。汪婉则从教育的角度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策进行了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第 4 期),指出,日据台湾时期初期和后期的教育政策有所变化,但其总督府一开始就制定了“国语教育”政策,明确了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对台湾人进行同化的政策,而且这一基本方针在日据台湾 50 年中始终没有改变。

(二) 中国抗日研究

1. 战时政治研究

继 2004 年田子渝在本刊第 1 期上发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再研究》后,他又有了新的创见。《1938 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3 期)一文,梳理了 1938 年前后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 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的传统说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

成的。

王奇生的《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通过对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的筹设;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三青团);教授入党情境;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联大区党部与学潮的论述,并与其他大学区党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与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在抗日根据地的法律、政治研究方面,翁有为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论述了关于汉奸罪行的法律设定、刑罚设定、惩治汉奸的立法依据和补充、汉奸入律问题刍议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期黄正林的《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考察了陕甘宁地区社会教育的背景、目标、根据地的社会动员、民众的政治参与,指出:政治动员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2. 战时军事研究

2006年抗战史军事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仅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刘庭华的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地转变的时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在以往中国大陆史著中,几乎都认为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后,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正面战场降到次要地位。作者在分析了1939年—1940年国民党正面战战役的规模、作战效果、战绩及其对中共的政策后指出,1938年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日本的军事进攻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整体上抗战仍还比较积极努力。

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日趋深入,杨奎松对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进行了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文章指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在战法上,二是在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化,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部队不仅难于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

3. 战时外交研究

中苏关系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中国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过程反复而曲折,一直是史家研究的重点。孙艳玲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条约签订背后两国的利益之争(《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文章指出,两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扩张方面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又存在重大的不同利益。中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希望苏联尽快参战,而苏联竭力避免加入对日战争。中苏能成功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这一条约是双方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的平衡点。而双方利益的差异,基本决定了

苏联不可能与中国签订具有互助性质的条约。

2006 年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呈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安徽大学学报》3 期发表了周乾的文章《论 1941 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探讨了舆论媒体对外交的影响。文章指出美国政府于 1941 年曾与日本进行了 8 个月的秘密谈判, 试图对日本作出局部让步, 中国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 立即表示反对, 中国报界迅速给予了严厉批评和谴责。虽然美日未能最后达成妥协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政府和舆论还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但作者的角度还是比较新颖并富有探索精神的。

中国在战时与盟国的合作是多方面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特务组织曾与英国情报机构有过密切的合作, 这段历史鲜为人知。马振犊、邱锦的研究利用英国和台湾的档案对此英国情报机构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合作做了梳理(《抗日战争研究》第 3 期), 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英在特工情报领域内的合作包括: 一、中英双方培训特工和战时服务队员; 二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抗日情报合作; 三是英国 SOE 情报组织在中国及远东地区的活动。

4. 战时经济社会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1 期潘国旗的《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分析了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严重困难时期、恢复和大发展时期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公债发行情况, 指出: 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 名称不一, 公债面额、单位各异, 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 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同期吴景平、何旭艳的《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一文, 弥补了有关战时信托业史研究缺乏的状况。认为: 在抗战期间特

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微不足道。

《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刊出一组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章。黄正林的《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对20至30年代和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地主经济受到了削弱,逐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向合作经济转变;通过选举树立了新的乡村权威,普通民众成为乡村权力主角;社会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形成;普及教育使穷人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乡村社会一改过去土匪横行的局面,民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些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使民众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相比,中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要深刻的多,因此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才取得了成功,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李柏林的《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考察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在减租减息政策推行后根据地的土地关系、阶级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认为:减租减息促使土地向中、贫农手中分散;阶级结构呈现出由两极向中间流入的态势;乡村社会生活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逐渐改善,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种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走向。李自典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与政府干预》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经济工作,晋察冀边区政府对当地农业发展从政策法规及具体实践的组织领导等多方面进行了干预,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这些为今日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

加及农村经济的繁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曲晓鹏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权益问题研究》一文,对战时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为保障妇女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权利的法律、法令、条规及实施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法令的贯彻实施,使边区妇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婚姻和教育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妇女的抗战积极性,对妇女自身的解放和抗战的最后胜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沦陷区经济研究方面,王士花的《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分析了日伪对华北沦陷区粮食的掠夺及统治,使该地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受到影响,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粮食的播种面积及单位产量都比七七事变前减少,粮食的流通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受到了影响。刘萍的《伪满“勤劳奉公法”的出台及其与协和会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考察了伪满“勤劳奉公”制度从萌芽到法律化的过程及与协和会的关系,认为:抗战时期伪满政府为增加劳动力,在协和会推动下,掀起了国民“勤劳奉公”运动。该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确保劳力供给资源,利用国家权利来掠夺青年劳动力。

5. 战时文化教育研究

李翠艳的《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分析、论证了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对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并引起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将宪政的理论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从总体价值来看,实施宪政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一致的政治要求,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必须循以发展的方向。

同期古为明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对抗战时期儿童保

育会的筹建、工作开展、成效进行了论述,指出: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中国妇女界的救亡团体,八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万名战时难童。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为民族培育了未来。同期董根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政策述评》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儿童福利政策产生的背景、实施情况,并指出其局限性。认为: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物征。是值得肯定的。

曹必宏的《日据时期的香港殖民教育》(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论证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三年来时间里推行殖民教育的过程:在大肆破坏香港原有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行殖民教育,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编订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教科书,推广日语学习,奴化香港青少年。在日本的统治下,香港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锐减,形成香港教育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6.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是抗战史研究的新课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旨在推动研究者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抗日战争史。袁成毅从战时经济、政治方面分析,认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经济上,它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存量,打乱并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政治上,战争的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继续争取民主斗争的成本和代价。荣维木认为: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

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他论证了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一是中国在战争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前者已有充分研究,后者有待深入研究。他具体地从政治、经济、国家主权三个层面的变化论证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范展分析了鸦片战争后“御侮与师夷的辩证统一”,认为:抗日之后必转为“师日”,只要中国还落在日本后头,这一历史现象便不容忽视。今天我们应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地研究、了解和学习日本,这是振兴民族应有的要求。马勇分析了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不能简单斥之为文化复古主义予以否定;分析了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的正负面影响,在这种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政治民主论”,从其论证的主观意图上说并非要将中国导入一条反民主的道路,而是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经典道路的独特道路来。王希亮论证了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东北“建设”的意图、东北重工业和铁路发展的原因、新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形成同日本“建设”东北殖民地的关系,认为:当殖民地的民族赢得独立以后,社会发展不可能彻底跳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在一个时期,它仍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着相当的影响。金普森论述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医疗卫生、农村经济等方面对浙江进行全面的经济、文化侵略,掠夺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使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受到重创。马振犊认为: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民众近代意识的开启和民智的提高,具有特别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这反映在民众团结、抗战建国融为一体、中共领导下地区民主选举制度等的实行及影响、民主党派的建立与活跃、抗战提升了中国融入国际

社会的过程等。左玉河论述抗战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认为:19世纪60年~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由于日本发动的战争造成的,是甲午战败打断了这场自强运动的现代化进程;30年代中期,又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粗暴地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中国施入了长达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苏智良以上海闸北为例,论证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军队对闸北的野蛮轰炸、侵略,人民伤亡、经济损失惨重。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李仲明从抗日战争时期京剧旧班社向新剧社的转化、京剧编演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两点,简要分析了抗战时期京剧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同期陆发春的《抗战时期胡适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一文,通过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对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研究,归纳出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胡适并未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他肯定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相关,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

在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型研究方面,黄岭峻的《抗战前后:民族意识的强化与返本开新的困顿——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四》(载《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分析了从

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民族精神的讨论,认为:抗战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从民族自保的角度,思想界相当一些人士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一个民族要延续,作为其象征的文化传统应该得以保存,并由此得出了返本开新的结论。然而,他们同样面临着自清末以来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一个悖论:即如果改变中国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因素,那么新的民族精神必定是一个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东西;如果不改变其中的实用理性因素,那么所谓民族精神的转型便是换汤不换药。正因为如此,直至抗战结束,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并未成功。

7.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

对战后遗留问题的研究内容很丰富,在2006年主要集中于中国抗战损失、南京大屠杀、保钓运动等方面。

孟国祥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战后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总体情况(《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文章对抗战损失中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损失统计从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包括资料的来源和出处问题、统计数据的可信度问题、损失计算的地域和时限问题、损失统计的标准和比价问题及损失的分类问题等,勾勒出了抗战损失统计研究的清晰的脉络。作者指出抗战损失的统计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建议先从局部做起,从当时调查完备的省份研究起,并集中力量研究一些疑难问题。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和拓展。程兆琦运用了大量的日文材料对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社会科学》(沪)第9期)。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歪曲了,“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作者通过对日本相关史料,

特别是日本右翼也不得不认可的公私文献的辨析,基本廓清了日本虚构派的谎言,证明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即使仅据日方文献也完全可以证明。作者写道:“把这些材料梳理清楚,我想日本虚构派不应该再有话说——如果真像他们自我标榜的论从史出的话。”王希亮则以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争及各派论点进行了评析。他指出,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经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较量。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虚构派只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采取各种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或“学术活动”之类根本不能与正当的学术研究同日而语(《抗日战争研究》第 4 期)。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郭永虎对美国政府对钓鱼岛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 4 期)。他指出,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托管琉球与“第 27 号令”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其托管之下。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打下了“楔子”。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攫取钓鱼岛的野心。周大计、刘培宝则对 20 世纪 70 年代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进行了分析评判(《抗日战争研究》第 3 期),指出 1971 年初为抗议美、日两国拟将中国的钓鱼岛随冲绳“归还”日本,中国留美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最终没能完成其既定的目标,但这场运动对一代人的政治观和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 人物研究

杨雨青的《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对战时中美租借关系中宋子文主管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作了个案研究。认为:宋子文主管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抗日战争时期接洽和管理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专门机构,在租借物资的获取和营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期莫子刚的《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考察了吴鼎昌主黔期间,为消除烟祸,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张珊珍的《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论证了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主管战时教育的功过,认为:在战争艰难岁月中,陈立夫在拟订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和征召青年方面所做工做,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相当的发展;其执掌教育亦有明显的消极影响,陈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防共反共,抵制“赤化”,逆时代进步大潮。同期刘俐娜的《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思想》一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

关于抗战时期胡适的研究,欧阳军喜的《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考察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始终,认为:自1931年以后,胡适已成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尽管他极力想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但还是受到了国内民族主义

思潮的影响。随着中日两国冲突加剧,胡适与学会的对日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的转变。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二 日本的相关研究

2006 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比较集中在一些热点问题上,有些方面则显得比较冷清。

(一) 关于朝贡关系的研究。

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不是那么火热,但依然受到关注。冈本隆司对于清朝和朝鲜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对朝鲜中立化构想的考察》(「朝鲜中立化构想」の一考察),从中立化构想的角度对朝鲜的“自主”进行了考察,虽然他的研究是围绕清朝和朝鲜关系展开的,但因为 1870 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为止的中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所以他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研究者来说,也很值得注意和参考。

小渊茂树的《李鸿章围绕日清开战的朝鲜政策》(日清开战をめぐる李鸿章の朝鲜政策),发表在《史学杂志》253 期,作者指出,李鸿章努力维持和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同时,也极力避免与日本开战。

在中琉日关系方面的研究,琉球大学西里喜行的研究依然值得继续关注。他的《咸丰同治时期中琉日关系再考》(咸丰・同治期の中琉日关系再考)(《东洋史研究》64 卷第 4 期)、《咸丰同治时期中琉关系中的铜材“献纳”问题》(咸丰・同治期の中琉关系における铜材「献纳」问题,系台湾第十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研讨

会提交论文)、《中琉关系史上福州琉球馆的诸方面》(中琉交涉史における福州琉球馆の诸相, 刊登于《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68期)3 篇论文, 对于咸丰同治时期中国、琉球、日本三国关系, 进行了考察, 强调琉球王国的主体性, 以及该期间三国关系的危机。福州琉球馆是琉球王国在中国福州的派出机构, 其担当的交流沟通作用不可忽视。

茂木敏夫的《从中国看朝贡体制》(中国から見た「朝贡体制」)刊登于《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关西大学)第1号, 作者从中国的角度, 分析了朝贡体系的理念、实践及其近代变迁, 同时作者也分析了费正清和滨下武志之间对于朝贡体系的不同认识。

(二) 甲午战争之后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研究。

该阶段的研究并非热门, 虽然显得成果比较零散, 但还是有些研究值得注意。斋藤圣二的《北清事变和日本军》(北清事变と日本军), 由芙蓉书房出版, 是关于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研究很重要的著作。相对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对于义和团期间的日本出兵研究不多, 作者利用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对于八国联军中的日本军队, 从出兵决定、部队构成、在中国的行动等方面, 都作了具体详细的探讨。日本在义和团期间出兵 8000 人, 在进占北京的军队里是最多的。其跃跃欲试, 想充当远东宪兵、积极和俄国争夺的行动, 对以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以及后来的日中战争, 都有直接的关系, 作者从出兵的角度, 把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作了详细描述, 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庄比佐子主编的《日本的青岛占领和山东的社会经济》(日本の青岛占领と山东の社会经济), 由东洋文库出版, 该论文集讨论了 1914 年到 1922 年山东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日本对山东的占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1914 年到日本返还山东的 1922

年的 8 年间,驻守青岛和山东铁道沿线的日本军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一百多册的调查报告书和统计资料,对于了解当时山东各个方面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东洋文库收集日本在华的各类调查报告,进行地域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年,也有不少成果出版,本书就是该系列成果中的一种。

关于该时期的研究,有 4 篇文章值得参考。

横山宏章《长崎和中国流亡者》(长崎と中国人亡命者),刊登于《历史评论》69 期,该文从长崎的角度来讨论中日关系,主要是探讨孙中山、柏文蔚等人在长崎的活动。清朝 1978 年在长崎设立了领事馆,很多日本人也是在这里坐船前往中国,可以说长崎是那个时期中日交流的一个窗口,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革命者来过这里,也有 1000 左右的华侨生活在这里。但是,长崎的华侨和横滨或者东南亚华侨不同的是,他们和革命党基本没有来往,也许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或者是因为他们处在清朝领事馆的监视之下,孙中山到长崎时,来拜访的全是日本人,没有一个华侨。该文的观点很有新意。

陶德民的《内藤湖南奉天调查的学术和政治》(内藤湖南の奉天調査における学术と政治)发表在关西大学的《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第 1 号,该文探讨了内藤湖南 1905 年的东北调查,指出此行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政治目的,其政治目的就是受政府委托,调查在中朝边界问题上出现争议的所谓“间岛”的情况。

张玉萍的《护法运动期间戴季陶的日本观》(护法运动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日本观),发表在《历史学研究》811 号,该文讨论了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指出虽然 1927 年他才出版《日本论》,但在 1917 到 1918 年的两年间,他 7 次往来日本,其客观冷静的日本观已经基本形成。滨口裕子的《1920 年代前期中国的反日运动和日

本》(一九二〇年代前半の中国における反日运动と日本), 刊登于《拓殖大学论集》第9卷第1号, 作者通过对日本二战前著名记者、中国社会问题专家橘朴的评论的分析, 指出了他1920年代前期对中国的期待, 以及这些期待的落空和30年代支持建立“满洲国”之间的关系。

(三) 中日战争期间中日关系的研究。

日中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依然是2006年的重头戏和热门。在日中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项目中, 有两本论文集问世, 都是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出版。一是山田辰雄、姬田光义主编的《中国的地域政权和日本的统治》(中国の地域政权と日本の统治), 该书是2002年6月哈佛大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讨论了战争期间中国的地方政权及其这些地方政权和日本统治之间的关系。

二是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主编的《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日中战争の军事的展开), 该书是2004年1月夏威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从军事的角度全面探讨了中日两方面的军事行动及其历史背景。

这两本书都是主张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基础之上, 排除政治、感情的影响, 展开多层次的、客观的、实证的全面研究。这种研究态度的提倡, 不论是对历史问题还是对历史认识问题来说, 都是很有必要的。

大里浩秋、孙安石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租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 由御茶水书房出版, 该书的作者们从2000年开始对上海、杭州、重庆、汉口的租界遗迹和史料进行了调查收集, 对于这4个城市日本租界的形成、建筑计划以及上海的日本人社会, 都作了翔实的调查, 饶有新意。

后藤春美的《围绕上海的日英关系 1925-1932年》(上海をめ

ぐる日英关系 1925-1932 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充分利用日、英文资料,讨论了英日同盟后英日关系的协调和对抗,以及他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态度。作者虽然讨论的是英日关系,但因为是围绕上海展开的,所以对于中日关系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战争及其战争认识、战争记忆问题,有三本书值得重视。一是聂莉莉的《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中国民众の战争记忆),由明石书店出版,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 1998 年开始,对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常德的日军细菌战地区进行了 7 年的调查访问,取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作者在此基础上,从学术角度,分析了中国民众战争记忆的形成,以及这些记忆的影响,调查扎实,角度新颖。二是仓泽爱子等主编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丛书中,《20 世纪中的亚洲太平洋战争》(20 世纪の中の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一书,由岩波书店出版,很有参考价值。对历史事实到现实的历史认识,都有客观的分析和探讨。三是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主编的《现代历史学和南京事件》(现代历史学と南京事件),由柏书房出版,该论文集从历史教科书问题、战后赔偿、南京大屠杀、性暴力、战争记忆等新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作者李仲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编审;

刘兵,《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辑;

高士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